

东域纪程录丛

——古代中国闻见录

[英] 裕摇尔摇撰摇

[法] 考迪埃摇修订

张绪山摇译

中华书局

译者引言 :亨利·裕尔与《东域纪程录丛》

汉学(汉学)广义上汉学即“中国学”)是 17 世纪中后期以后在欧洲兴起的一门学问,是欧洲资本主义势力兴起后欧洲人在东方从事经济文化活动的产物。欧洲列强在海外的殖民活动,一方面使原来处于封闭状态的世界各国、各地区联为一体,同时也使欧洲各国迅速地获得了对于欧洲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的空前广泛而深刻的认识。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首先将势力扩到远东地区,将中国纳入它们的活动范围。耶稣会在对抗新教改革运动失利后,将传教活动转向东方。随着传教事业的大规模展开,欧洲对中国历史、地理、语言文字、经书典籍、艺术、教育制度和宗教风俗等都获得越来越充分的知识和认识,其深度和广度大大超越古代的任何时期。中国作为一个认知对象,此后在西方视野中再未消失。相反,对现实中国的兴趣促使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更趋细致、深刻。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西方“汉学”的基础由此而奠定。

18 世纪,基督教教士、外交家、商人、探险家、旅行家和学者对中国的介绍和研究使“汉学”的土壤更加深厚、肥沃。但是“汉学”发展成为一门举世公认的专业化的学科则是在 19 世纪,其标志有三:一是具有一定规模的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汉学家队伍的形成;二是相当数量的“汉学”研究机构的成立;三是一批以“汉学”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刊物的

创办。这些重大变化的出现,其深层的社会背景就是生机勃勃的欧洲资本主义与衰落不堪的中国封建主义进入空前广泛的正面冲突。18世纪中叶的中英鸦片战争是其具体体现之一。18世纪的政治形势和商业关系所提出的客观要求,给予汉学研究以极有力的推动。不过,由于欧洲列强文化条件、学术传统的差异,各国政府对“汉学”研究的态度和政策的不同,18世纪初至19世纪初,欧洲各国汉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和达到的水准也有差别:法国汉学成就最大,水准最高,居于遥遥领先地位,其次是英国、荷兰、俄国、德国等。

这一时期英国汉学的发展体现在一系列事件上:1704年,皇家亚洲学会成立;1707年伦敦大学设立了汉文教授之职,1708年又创设了汉语讲座,1709年成立东方学院(1717年改为“东方和非洲学院”),1717年牛津大学设立汉学讲座,1725年剑桥大学设立汉学讲座。此外,利物浦、曼彻斯特也有汉学学科。在这些机构背后是一大批活跃而有才华的汉学家,如,马礼逊(研鞞鞞鞞鞞鞞,1734—1804)、迈都斯(宰援匀援鞞鞞鞞鞞鞞,1751—1804)、理雅各(分援鞞鞞鞞鞞鞞,1791—1845)、威妥玛(裁援匀援鞞鞞鞞鞞鞞,1800—1859)、毕尔(杂援月鞞鞞鞞鞞鞞,1804—1859)、巴克尔(耕援匀援鞞鞞鞞鞞鞞,1806—1861)、马士(匀援月援鞞鞞鞞鞞鞞,1815—1884)、翟理斯(匀援粤援鞞鞞鞞鞞鞞,1815—1893)、苏慧廉(宰援援鞞鞞鞞鞞鞞,1816—1897)、斯坦因(粤援鞞鞞鞞鞞鞞鞞鞞,1816—1897)、穆尔(粤援悦援鞞鞞鞞鞞鞞,1816—1897)、威烈亚力(粤援宰鞞鞞鞞鞞鞞鞞鞞,1817—1897)、裕尔(匀援再鞞鞞鞞鞞鞞,1817—1897)等。

在这一大批英国汉学家或称东方学家中,亨利·裕尔的经历颇具个性。他没有接受过经院式的汉学教育,却最终成为经院式的汉学家。他于1817年缘月员日出生于苏格兰的中洛锡安(鞞鞞鞞鞞鞞鞞鞞),其父威廉·裕尔(宰鞞鞞鞞鞞鞞鞞鞞,1817—1897)曾是英国驻印度军队驻防孟加拉部队的一名少校军官,精通波斯文和阿拉伯文,具有丰富的东方学知识。他的东方经历和情调对他儿子的未来志趣可能有一定影响。亨

利·裕尔少年时代在爱丁堡中学求学,1847年进入设在阿第斯康比(粤译:爱丁堡)的东印度公司辖下的军事学院学习,1850年加入设在查塔姆(粤译:查塔姆)的皇家工兵部队。1854年被派往印度,开始了长达20年的东方军旅生涯。他先在卡西亚山中负责运煤,1857—1858年转赴印度西北各省修复莫卧儿帝国留下的水利系统;以工程兵身份参加两次锡克战争(1858—1859,1861—1862)。在印度服役期间,亨利·裕尔广泛游历印度次大陆和马来半岛,获得详细而实际的东方地理知识。1870年亨利·裕尔退役,军衔上校。裕尔退役后没有进入相关的研究机构,而于1874年移居西西里岛的巴勒莫,专心从事东方学(汉学)研究。他的两部名著《西域纪程录丛》(两卷,1874)和《马可·波罗游记译注》(两卷,1875)就完成于居留巴勒莫时期(1874—1875)。1875年裕尔返回英国,在伦敦定居。裕尔另外的著作包括1875年他作为使团成员之一出使缅甸后写成的《出使阿瓦宫廷记》,其中对东南亚地理颇多论列;还有《乔达努斯所记东方奇特事物》(1876),《玄奘所记中亚各国考》(1876),《英—印字汇》(1876)等。由于裕尔没有进入研究机构获得相应学术称号,所以他的著作多冠以“上校亨利·裕尔”。这个称号与其著作的学术性显得不太协调。裕尔曾担任哈克路特学会主席多年。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中,裕尔除继续从事东方学研究外,也参加政治活动,任印度议会议员(1875—1880)。1880年10月14日死于伦敦。

亨利·考迪埃(粤译:亨利·考迪埃)1838—1898是法国著名汉学家,1838年出生于美国的新奥尔良。1857—1862年考迪埃曾旅居中国上海,回国后任巴黎东方语言学院教授,是亚洲学会会员、皇家学会荣誉会员和法兰西学院会员,是重要的东方学刊物《通报》杂志的创办人。考迪埃被认为是西方汉学家中最伟大的先驱者之一,一生著述甚丰,主要著作有《中国学书目》缘卷(1861—1862),《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猿卷,1862),《中国通史》(源卷,1862)等等,其中对汉学影响最大的是

其著作中关于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材料进行分析和论说,具有序论的性质;后一部分是这时期(西方)作家关于中国的原始记载及其译注。其他三卷的内容分别是:第二卷为鄂多立克游记译注,第三卷是对这一时期派往印度、中国的传教士所写信函和报道,以及拉施丁、裴戈罗提和马黎诺利等人中国记载的译注,第四卷是伊本·白图泰和鄂本笃游记的译注。从内容上看,新航路发现前所有西方作家关于中国的记载皆汇集于此四卷书中,加上另外译注的《马可·波罗游记》,亨利·裕尔基本上完成了西方古代、中世纪所有主要作家关于中国记载的搜罗和译注。

《东域纪程录丛》作为这一时期出现的汉学名著,其学术价值自出版后即受到众多西方汉学研究者的普遍关注。考迪埃在晚年花费巨大精力重新修订裕尔的《马可·波罗游记译注》和《东域纪程录丛》,说明亨利·裕尔这两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即使在汉学研究整体水准高于英国的法国汉学界也受到高度重视。裕尔书中所作许多注释、考证长期被奉为经典之作,西方许多汉学家如戈岱司、夏德、伯希和、斯坦因、赫德逊、李约瑟等均加以引用。在19世纪上半叶的国际汉学界,伯希和是睥睨同辈的领军人物,有“学术警察”之称,对同代汉学家少有赞许,但对亨利·裕尔却明确表示敬意,称赞他“见识敏锐”(见《伯希和汉学著作选集》);对他的《东域纪程录丛》、《马可·波罗游记译注》和《英—印字汇》三部著作颇为赞赏,在著作中多次加以引用^①。《东域纪程录丛》对西方汉学界的影响,可由它的再次印行得到证明^②。

① 据他的学生和好友登尼斯·西诺(见《亨利·裕尔》)说,伯希和平生最重视的汉学家有裕尔、马伽特(见《亨利·裕尔》)、劳费尔(见《亨利·裕尔》)和布列施乃德(见《亨利·裕尔》)。见《亨利·裕尔》,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0页。又见《亨利·裕尔》,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0页。

② 亨利·裕尔《东域纪程录丛》,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0页。又见《亨利·裕尔》,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0页。

我国学术界对这部著作的重视表现在各代学者对它频繁而充分的利用上。早在 19 世纪初,著名中西交通史研究家张星烺(1863—1937)先生编纂《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时就曾最大程度地参考、利用过该书研究成果。张先生书中的西方史料主要取自此书,其考证结论也多取该书注释。当然,张先生的著作在资料搜集考证上,尤其是汉文原始资料的搜集考证上已大大超过了裕尔—考迪埃,可谓后来居上,但裕尔—考迪埃的开拓之功不可埋没。值得一提的是,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出版以后,另一位著名学者冯承钧(1891—1947)先生曾撰文加以评论,其中提到裕尔此书,认为该书“所辑诸行记,多为未识西文者所不经见之作品,诚有译之必要”,但他又认为“其中考证太旧,是一大缺点也”^①。对此,张星烺并不赞同,认为“冯氏谓英人裕尔所著之《契丹路程》(即《西域纪程录丛》——译者)书中考证太旧,鄙意甚不以为然。此书之第二版,经法人考迪埃之修订,出版于 1937 年,距今年十四年,距拙著脱稿之年 1927 年,仅十年耳。最近西洋著作家不言此书之旧,而学术落伍之中国人反嫌其旧,毋宁太过乎?”^②事实是,《西域纪程录丛》确实表现出了持久的生命力:张先生的巨著出版以后,它仍在 1937—1938 年以影印形式在我国出版,由文殿阁书庄发售;1937 年、1946 年又两次在台湾重印^③。至于参考引用,更是代不乏人。1936 年,朱谦之(1897—1984)先生修订他的名作《中国哲学对欧洲文化的影响》,列出所参考的重要资料,中西交流史部分位居首位的参考书就是裕尔—考迪埃的《西域纪程录丛》(译作《契丹纪程》)。在近些年出版

① 冯承钧:《评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六册,中华书局 1983 年,第 188 页。

② 张星烺:《答冯承钧 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见张星烺,上引书,第 188—189 页。

③ 刁接再:《双向愉悦的翻译——冯承钧先生藏书辛卯赠书题词》,《国际汉学》,第 1 期,第 10 页。

的与中西交通史相关的著作和文章中,这部著作仍被列入重要参考书之列。可证我国学术界对它的重视。它的学术生命力之所以持久不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部著作自始至终是以它对基本史料的保存和具体扎实的考证为其突出特点。

当然,以今天的眼光和标准看,《东域纪程录丛》的某些考证结论已有过时之感,但仍为一家之言;它对西方原始资料的搜集整理,即使在今天看来,仍较为全面、完整。另外,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扩大,我国学界对中外学术交流史日益重视,对于研究汉学发达史的学者,了解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汉学学术著作是非常必要的。因此,《东域纪程录丛》作为一部汉学名著,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至少具有“立此存照”的意义。

不过,近一个世纪中外学术研究的突飞猛进毕竟使这部昔日的名著显得陈旧。从写作体例上讲,《东域纪程录丛》内容繁多,译注者为澄清一个问题,不惜在注释中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使得全书注释多于正文,正文淹没在注释中。这虽可使读者对正文内容获得较为透彻的理解,但同时也会造成阅读的不方便。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裕尔和考迪埃二人均不通晓汉文,二人虽为当时硕学博闻之士,并试图充分利用译为欧洲语言的汉文史料,但毕竟为时所限,不能有更大作为。未能充分利用中西交流史中的丰富的汉文史料,以补西方史料的遗漏和偏颇,是这部著作的最大缺陷,使这部著作逊色不少。鉴于这一点,我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指出一些明显的错讹,并补入一些相应的汉文史料。不过,考虑到这是一部翻译著作,理应保存原貌,而且有关中西交流的汉文原始资料,读者较容易从相关著作中获得,没有必要全部移置于此。更何況译者学识谫陋,以犬吠耕,不胜其力。对于译文中的不当和错讹之处,欢迎批评。

作的关系一样。

这项工作展开时,我所需要的必要条件超出了环境所允许的范围,或者说,这项工作几乎是从未有人尝试过的。我所能够读到的资料确实都有助于说明我关注的作家,但巴勒莫不是伦敦,也不是巴黎,一本主要著作的付阙,经常使我对一个难题的研究停滞不前,其情形就像一个旅行者在设计一个路线复杂的行程时,由于其交通导示图上出现的一块黑污点而受阻,被迫在几条线路上停顿下来一样。

我也痛苦地认识到,在下面所要探讨的许多论题中,任何东西都不能补救真正的东方知识的缺乏。多年来对印度斯坦语的一定程度的了解,以及对基础波斯语的一些记忆,一直有些用处,但有时它们可能已使我误入歧途,就如同昏暗的灯光易于使人误入歧途一样。

在我所涉及的作家中,英语读者或多或少能够读到鄂多立克、伊本·白图泰和鄂本笃的著作。对于鄂多立克的著作,读者可以读到哈克路特译本,对伊本·白图泰的著作,读者可以读到李(蕴藻)根据一个阿拉伯文略本所作的翻译,而对鄂本笃的著作,读者可以读到阿斯特利(粤译)汇编中的叙述。

自阿斯特利的著作发表以后,一百二十年过去了,对于这位勇敢的耶稣会士穿行过的地区,我们的知识虽仍然有许多巨大的空白,但已大大扩展;然而据我所知,另外两位旅行家的著作还从未有人进行系统的编订,也就是说,从未有人打算对他们的游记进行评注,以期考证出他们访问过的地方,阐释他们的记载或鉴别其记载中的错讹。

关于伊本·白图泰,像约翰·布尼安(允禄)的拉丁文译本一样“我的译本转自阿拉伯文”;但不是从李所依据的略本,而是像德弗里麦里(允禄)和桑圭奈蒂(允禄)的法文译本一样依据未删节的游记。虽然译文版本借用,但注解没有借用;而且我坚信,对于这位充满好奇心的旅行家,我的评注会提供一些新的见解。

在本书征引的其他作家中,自负、聒噪但又颇为诚实的约翰·德·马黎诺利是最引人注目的。他的作品偶尔被埃默森·坦南特爵士引用。对于埃默森·坦南特爵士,很少事物能逃脱他如炬的目光。如果不是埃默森·坦南特注意到他,我想马黎诺利在英国几乎是不会为人所知的。

本书所收入的每一位作者,在讲述他们的故事前,都将在适当的位置介绍其背景经历,所以这里不需要对他们逐个多费笔墨。

对文中出现的重复,我无需辩解。在一本汇编而非选集中,重复不可避免。但在注释中有时也出现重复,则是可怕的。对这种情况,我请求宽宥。我的住处离印刷厂很远,客观环境要求我先将前面的稿件交付印刷厂,而后面的部分在数月后才告完成,这样我无法对整个著作进行通贯的修改。

一些好心的朋友不惮其烦向我提供参考书,或解答与本书相关的问题。我对他们表示热诚谢意;但这里我将只提及梅杰君和马卡姆君的名字,承蒙二位好心,他们还依次检读了排印中的二校样。

我相信自己付出的巨大劳动不会白费。我已经尝试着将一个宏伟主题的一个别具一格的方面相当全面地呈现出来。这个主题在过去所有时代都一直保持着独特的魅力。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跨越广袤的亚洲大陆传来的赛里斯人——他们居住在东大洋岸边过着与世隔绝、平和而富足的生活——的缥缈的传说,古代的人们已多少感觉到其中迸发出的魅力。马可·波罗、鄂多立克的著作以及鄂多立克著作的剽窃者曼德维尔著作的手抄本和译本的大量出现,说明这些旅行家所叙述的那个人口众多、生活富庶、艺术发达、秩序井然的契丹文明,对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产生过同样的吸引力。当葡萄牙人的发现向人们展示那就是中国的时候,这种魅力之火再次燃烧起来,许多人和一位古怪的耶

稣会士一起惊诧于上帝何以对一群异教徒如此慷慨^①。近三个世纪的知识偏颇差不多熄灭了这种魅力之火。近些年对中国情形的熟悉已产生了众所周知的结果,对一个衰败中的文明所做的进一步考察已显示出,在这个庞大而又奇妙的组织的核心,现在存在着多少腐败的成份。

我们知道,在文明和创造力上早已渡过巅峰、同时在人口和道德上也走下坡路的一些社会群体,其前途似乎是不难想象的。但在中国,伴随着道德和思想上的衰败和混乱的,却是人口的巨大增长,几乎达到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对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前途命运做出估计,确实是很困难的。基督教势力是一些民族的神圣复兴力量,它至少三次进入中国——尽管有时是以极不完备的形式进入中国。两次似受到扼制而熄灭,另一次则是被曲解利用。未来属于上帝。对于聚拢在世界上空的云霭,中国与之息息相关。这个与迦勒底最古老的国家有着同样悠久历史的帝国,现在似乎正在走向崩溃。从前她经常分崩离析,又聚而复合,她经常被征服,但却挣脱枷锁、获得自由,或者同化了她的征服者。而征服者却从他们入侵的这个国家获得了中国人拥有的文明。正在搅动着这块土地的内部骚动,遇到了源自西方的新兴的陌生的力量。谁能预测这个神秘过程的结局是什么?

谨致问候。

匀掇裕尔

巴勒莫, 1852年 苑月 圆日

^① “悦恩阅案判嫌过火警圣徒崇德皂, 洋烟先者老, 遭孽增烟成” 运动票则, 悦恩阅案判嫌过火警圣徒崇德皂, 洋烟先者老, 遭孽增烟成”

第二版序言

《东域纪程录丛》两卷于 1877 年出版。这是亨利·裕尔爵士为哈克路特学会编纂的第二部著作。几年前(1874 年)裕尔曾译注过乔达努斯修士的《奇特事物记》。这两部著作很长时间已绝版。《东域纪程录丛》的副本间或出现在书商的目录表上,索价奇高。长期以来它一直是所有从事古代和中世纪远东研究的人的便览手册,对于这样一本书,我无须再加以赞美之辞。大家都承认,对于所有感兴趣于中国、中亚历史地理,乃至更广泛的亚洲历史地理的人们,《东域纪程录丛》都是必备的研究指南。这本书问世时,几乎囊括了迄至当时所知道的有关东方历史的全部知识,尽管这位博学的编纂者谦逊地使用了《中世纪中国闻见汇编》这一副标题。1877 年以来,由于新地域的发现和人们在迄今未被充分研究的国家所做的旅行,科学、特别是地理学获得迅速的发展,裕尔本人在他 1875 年初次印行的巨著《马可·波罗游记》的新版本中,已加入了大量新材料,但未对《东域纪程录丛》进行补充。所以,有必要出版新的《东域纪程录丛》,将所有最新资料搜罗进去。我曾是《马可·波罗游记》第三版的编者,大家认为我有特殊的资格来完成这项新的任务。我的故交、博学的哈克路特学会主席马卡姆爵士,要我担当修订《东域纪程录丛》的重任。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一提议,借此机会表达我对裕尔其人的敬

慕之意,并表达我对这位早已大名鼎鼎的地理学家的钦佩之情。

在这里我可以重述我在《马可·波罗游记》第三版前言中说过的话:“对于亨利·裕尔爵士的注释,我几乎未做任何删除,只是作了很少的变动。只有在最近的资料证明他有错的情况下,我才这样做。我对裕尔的注释做了补充,希望这些补充被证明是有用的新材料。”在修订《西域纪程录丛》时,我尽可能坚持这些原则,但是,除了附加众多的注释外,预论中^①增加了以最近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写成的关于中亚的新的一章,还有少量补充性注释。大家认为这是必要的。关于中国人对罗马帝国的知识一章的开端部分已全部改写。新增加的材料已使这部著作的篇幅变得很大,所以需要将它印成四卷,而不是两卷^②。

在《马可·波罗游记》一书的前言中,我们提到一些著作,除此之外,还应提到奥瑞尔·斯坦因爵士有关他在中亚所做的旅行及其发现的论述,我的同僚和朋友沙畹教授论述西突厥的富有学术价值的著作,聪慧睿智的年轻学者伯希和教授为我补充的众多价值极高的注释。我还可以提到其他许多著作,但人们将在注释或附在第四卷末尾所附的书目中看到这些著作。

哈克路特学会委员会和尊贵的学会主席选择我负责修订新版《西域纪程录丛》,于我当视为殊荣,对此我表示感谢;同时我也要感谢埃米·弗朗斯·裕尔(原名云梯,译名再志)小姐,她允许我从《马可·波罗游记》第三版复制了她父亲的肖像。对剑桥大学出版社为出版本书付出的劳动,谨表示谢忱。

亨利·考迪埃

巴黎,民国元年 癸卯月

① 在裕尔此书中,我们翻译的第一卷为预论。——译者

② 我个人增补的部分以[]标出。

假如我们把中国想像成一个孤立的帝国 ,一个在亚洲边缘、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离开来的帝国 ,一个永远拒绝外国人进入其中、对外关系只限于与最近的相邻民族有着旅行交往的帝国 ,那么我们对于中国的观念将是很不正确的 ,而且我们读该国历史的时候 ,将只能获得很不完备的观念。

——阿贝尔·雷慕沙

员

国铁。员援罗马史上记载的与赛里斯人直接的政治交往。员援我们不能要求古代人对如此遥远的地区有精确的认识。托勒密资料的模糊、混乱不可避免。员援中国人和罗马人的彼此认识在见解和错误上具有相似性。员援赛里斯”一名与丝绸有关。语源问题。历久盛行的关于丝绸性质的错误认识。包撒尼阿斯的特殊知识。古代地理知识的起伏变动 ;阿拉伯人中存在相似现象。员援中国人记载的古代中国同欧洲的丝绸贸易。拜占庭作家记蚕种传入事 ;文中所述的蚕种输出地尚不明确。员援希腊作家关于中亚突厥部落的片断中记载中国历史事件。远苑世纪希腊作家对中国的记载。员援科索马斯的生平和著作。员援科索马斯对中国地理方位的正确认识。员援科索马斯对中国的称呼 ;他了解丁香国的大致位置。员援赛奥菲拉克图斯·西莫卡特称中国为“桃花石” ;他记载中的中国。员援赛奥菲拉克图斯著作摘录。员援对这段记载的评论 ;“桃花石”一名可能代表的名称。员援此后拜占庭地理学进入黑暗状态 :查尔康德拉对中国的记载可以为证。

员援我们称之为中国的这个幅员辽阔的古代文明之邦 ,在西方人看来 ,总是朦胧若庞然大物 ;尽管它与西方相距遥远 ,但映在西方视野中还是形成巨大的视角。我们发现 ,在不同的时代 ,它或者被视为沿亚洲巨大的半岛和岛屿形成的南部海路的终点 ,或者被视为横穿亚洲大陆的北方陆上通道的终点 ,依照上述情况它以不同名称被区别开来。

在前一情况下 ,它几乎总是以“秦”、“秦奈”、“支那”(员援,悦员援,员援,悦员援)之类名称见称 ;在后一方向上 ,古代称为塞里斯国(员援) ;中世纪为契丹国(员援)。

员援就像其他许多与远东贸易和地理相关的词汇和名称一样 ,悦员援
圆 这个名称被认为是经由马来人传下来的 ,马来人以秦王朝之名称呼这个东方大国。稍早于公元前 圆世纪的时候 ,秦王朝建立过为时短暂但